

获加拿大2013年第十二届查尔斯·泰勒奖

*SWORD OF THE SPIRIT
SHIELD OF FAITH*

灵魂之剑 信仰之盾

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

Religion in American War and Diplomacy

[美] 安德鲁·普雷斯顿 著

罗辉 译 徐以骅 校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SWORD OF THE SPIRIT
SHIELD OF FAITH*

灵魂之剑 信仰之盾

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

Religion In American War and Diplomacy

[美] 安德鲁·普雷斯顿 著

罗辉 译 徐以骅 校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敬文(455979309@qq.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之剑 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美)普雷斯顿 著;

罗辉 译;徐以骅 校.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8

书名原文:SWORD OF THE SPIRIT, SHIELD OF FAITH: RELIGION IN AMERICAN WAR AND DIPLOMACY

ISBN 978-7-5060-8398-0

I. ①灵… II. ①普…②罗…③徐… III. ①宗教-关系-外交-研究-美国
IV. ①B928.712②D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7754 号

SWORD OF THE SPIRIT, SHIELD OF FAITH

Copyright © 2012, ANDEW Preston

All rights reserved

灵魂之剑 信仰之盾

LINGHUN ZHI JIAN XINYANG ZHI DUN

——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

[美]安德鲁·普雷斯顿 著 罗辉 译 徐以骅 校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3

字数:690 千字

ISBN 978-7-5060-8398-0 定价:8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中文版序

徐以骅

美国外交和美国宗教研究堪称美国研究的两大显学,有关论著可说是汗牛充栋,但结合此两大领域的研究却为数寥寥,而通史性专著则更是屈指可数,两大领域或更准确地说外交史学和宗教史学这两大史学传统实际上互相将对方边缘化,即外交史学通常不深查宗教,而宗教史学则往往不细究外交和战争,结果此两大史学少有交集,甚至形同陌路,且互为自身研究领域的短板。近年来美国外交史学的“文化转向”,或美国宗教史学的国际化,似乎都未能促成两大学科的对话。《灵魂之剑 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一书的问世可说是为上述两大史学的整体性结合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填补了美国历史研究中这一少有的空白。

本书作者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原籍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大学本科毕业后便游学于美欧,先后在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加拿大、美国 and 瑞士的若干所院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为英国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的高级讲师,专门教授美国史和国际关系史课程。作为美国外交史学家,安德鲁·普雷斯顿另撰有《战争委员会:麦乔治·邦迪、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越南》(*The War Council: McGeorge Bundy, the NSC, and Vietnam*)(2006年版)和《尼克松与世界:1969—1977年美国对外关系》(*Nixon in the World: U.S. Foreign Relations, 1969-1977*)(2008年版)两本专著,以及和他人合编的著作《美国与世界:从美西战争到反恐战争的文献史》(*America in the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 from the War with Spain to the War on Terror*)。近期该作者又将出版专著《美国对外关系简论》(*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和编著《信教的共和国:20世纪美国的宗教与政治》(*Faithful Republic: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United States*),其写作计划还包

括撰写一本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签约的关于美国历史上宗教安全理念的专著，是当前美国外交史领域最活跃的中生代学者之一。

本书作者在利用欧美诸多档案馆、总统图书馆、神学院校、宗派教会所藏大量档案和其他文献的基础上，以英文正文 613 页和全书 832 页的篇幅，对从 17 世纪初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到 2009 年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开罗演讲”的 400 多年以来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宗教因素作了全方位的系统考察。本书在 2012 年问世后，立即成为专业书评界的“宠儿”，被誉为在宗教与美国外交和战争研究领域集此前各种相关研究之大成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有评论甚至称其为关于美国历史的“全新宏大叙事”。《美国研究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第 48 卷第 2 期) 为该书辟“圆桌讨论”专栏刊登了评论文章。2013 年 5 月该书还获得了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奖。

如前人关于“美国是具有教会之魂的国度”的著名论断一样，本书作者想要说明的是，宗教对美国无所不在的影响也延伸到对外关系领域，并且“一直与美国外交和战争有着独特且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要充分说明宗教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或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美国对外关系，并究竟产生何种影响，这即使对具备美国外交和宗教两大史学训练和研究基础的学者而言，也绝非易事。

本书作者对宗教如何影响美国外交的解释，可归纳为某种“基因论”。与此前不少学者一样，本书作者亦把宗教称为“美国外交关系的良心”。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宗教因素。这是因为：(1) 他们是在宗教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宗教对他们个人有程度不一的重要性，这可被称之为“个人基因”。(2) 宗教在美国极为普遍，而美国大众民主的性质意味着政治和外交精英不能与广大信教民众脱节或相悖而行，即他们可以不喜欢、不赞同、不倾听民意，但他们“就是不能忽视民意”。这可被称为“民主基因”。(3) 在自然条件上受两大洋“保护”且无强邻的美国一直以来享有某种“免费的安全”，或者搭上当时作为海洋安全保护者英国的便车，这种在外交决策方面缺少安全威胁的局面和“选择的自由”，使“基于理念和价值观而非安全的其他因素”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且使宗教在塑造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这可被称为“地缘基因”或“灵性地缘政治”。上述各种基因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充斥着道德主义色彩和宗教性语言，而宗教也就成为美国例外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本书作者虽不认为宗教

决定了美国外交政策,但其却是美国政治语言和决策机制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对美国对外关系具有持续性的影响。

在解读宗教对美国对外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方面,本书作者如书名所示采用了“剑(矛)盾论”作为论述主线。所谓“灵魂之剑”指的是美国历史上以上帝之名所进行的战争、以保护所谓普世价值观和人权所推进的运动,以及充斥宗教语言的外交活动,其背后不外乎“神国”、“新耶路撒冷”、“天定命运”、“山巅闪光之城”等主要源自基督教的理念(即“基于信仰的扩张意识形态”);而所谓“信仰之盾”则指的是美国外交史上基于或源于宗教的和平主义、反干涉主义、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等理念和实践。与世俗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以上两大宗教主线或宗教团体内部思潮和派别之间的冲突亦贯穿于美国历史上的战争与和平,并且构成与美国外交政策鹰派和鸽派相对应的宗教右翼和左翼。在美国外交史上,“灵魂之剑”和“信仰之盾”常常是同时并举的,构成作者所称的“理想主义综合”(idealistic synthesis)。但近年来由于宗教新右翼的崛起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福音化”的倾向,“灵魂之剑”比“信仰之盾”更受媒体和学界的关注。本书对以宗教为基础的和平主义以及反战运动的重视和发掘,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对上述倾向的纠偏。

如果说“大而全”是本书主要特点和贡献的话,那么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方面。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本书不仅关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关乎美国的对外关系。因此本书的考察范围并未局限在或聚焦于国务院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而是囊括了包括各种教会、宗教游说团体、传教团体、宗教慈善组织、宗教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在内的非官方行为体。作者还认为,了解宗教在美国广泛影响的唯一之法就是兼顾决策精英以及广大信众这高低两端。后者虽不制定政策,却通过政治压力和海外行动主义对决策产生集体影响。以上这些观点和研究路径都有助于扩大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本书所涉及的宗教方面,作者不仅对基督教新教的涉外活动、人士和影响有浓墨重彩的描述,对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新时代等其他宗教或宗教运动的涉外活动也有程度不等的交代。不过尽管对其他宗教尤其是对美国与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可有更多的研究,但鉴于基督教新教在美国历史上的支配性地位,作者把论述重点放在基督教新教尤其是新教权力建制的有关活动或出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有关人士之

上,这种处理虽有不足但可理解。

“厚今薄古”是本书的另一特点。本书用于叙述从17世纪初北美殖民地建立到1898年美西战争近3个世纪的宗教与美国战争和外交史的篇幅有英文12章229页,而用于叙述从威尔逊政府至2009年这不足百年历史的篇幅则长达17章,加上尾声共380页,所以20世纪是本书作者最为用力的部分。作者认为,这100年的历史,如“连尾带头”(即前接美西战争,后连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美国共进行了五次“圣战”,即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最后一次“圣战”被作者问了问号,似乎未遂,但从世纪之交美国对外政策的“福音化”的以及反恐战争的涉教性质来看,应该够得上作者关于“圣战”的标准,即宗教和宗教团体在美国主要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对战争中发挥着具有持续性的重要作用。

“圣战”的提法显然是本书“卖点”,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不过也更加突出了本书关于宗教在美国外交和战争中的重要性的基本观点。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所用的英文 *crusade*,即可以译为“圣战”,也可译为十字军东征、(宗教性)讨伐或改革运动,甚至布道大会,如葛培理福音布道大会(*the Nilly Graham Crusade*),与其伊斯兰教的近义词 *Jihad*(吉哈德)一样,也很难准确地译成中文,而且作者引述当事人和文献资料以及作相关分析时,时而也使用 *Holy War* 一词,尤其在涉及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当时北美殖民地的许多清教徒无论在神学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把向外扩张等同于所谓“正义战争”,又用“教同伐异”的“圣战”来取而代之。在本书的所谓五次圣战期间,由于包括政教分离传统在内的各种原因,宗教虽然对美国外交和战争决策发生了作用,尤其是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但此种作用或影响仍然有限,而且越是晚近越不具有本书作者所说的“决定性和形成性”。尽管教会人士尤其是宗教保守派人士在教堂讲坛和媒体上大讲“圣战”,甚至一些美国外交决策精英也口不离宗教,言必称上帝,但如涉及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时,极少有政治家会公开使用有中世纪联想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一词。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因使用此词来形容反恐战争,便招致国内外舆论的严厉批评。因此,中文版把 *crusade* 译为“圣战”,主要是想反映作者试图说明的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通过精英(个体)和基层(群体)上下两头对美国对外关系运作机制(不一定是结果)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和准确的中文表达。如果译为“征伐”似不够传神,而译为“十字军东征”那就更

具争议性且辞不达意了。

本书规模宏大,剪裁得当,持论公允,叙述也精彩流畅。但美国向称严苛的学术评论界在对该书称誉之余,对其各种软、硬伤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除了关于本书的遗漏、偏颇和错谬的评论外,最严厉的批评莫过于美国葛底斯堡学院亨利·卢斯讲座教授艾伦·C.圭尔佐(Allen C. Guelzo)。圭尔佐教授在2012年4月的美国保守杂志《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上撰文批评本书沿用传统宗教史的套路,许多部分往往是宗教史而非外交史,而许多部分则仅仅是美国历史,与宗教和外交均扯不上多大关系。更有甚者,圭尔佐教授批评本书把宗教描述成美国外交的某种因素、力量以及组成部分,但并未建立宗教与某一外交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对人们了解外交官和总统的具体决策并无助益。

必须指出,作为可能性(妥协)艺术的政治与作为不可能性(不妥协)艺术的宗教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不相容性,而外交决策又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很难作量化分析。史学和史著的令人困惑同时也令人着迷之处就在其常常处在不断被修正的过程中,史学考证较少有盖棺论定或一锤定音的事。本书的通史性质也不允许作者就某些具体个案做从容的考证。作为跨越或连接两大领域的研究,本书比起单一领域的研究更有难度。作者目前还处在学术上升期,仍有潜力可挖。因此本书虽有标杆性,但要求本书达到与西德尼·E.阿尔斯特罗姆(Sydney E. Ahlstrom)的《美国人民宗教史》(*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或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的《美国人民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这类美国宗教史和美国外交史经典名著同样的高度,是不太现实的。

本书中译本的问世将有力推动国内学界对宗教与美国外交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笔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目前大致只能达到“主要能胜任,间或有创见”的程度,并且作为一个主要以外国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其研究水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相关译著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因此翻译这本重要著作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学术圈外的读者,了解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宗教因素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外交,而且对了解宗教在其中作为经常性和情感性因素的中美关系,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事实上,鉴于宗教在美国历史上作为剑与盾的双重属性,人们在本书中如要选取某些事例或某些言论来证明在对外关

系领域美国宗教和宗教团体是“圣战工具”或“和平使者”，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较为可取的则是比较全面和平衡的观点，而这正是学界对本书最主要的评价。

本书译者罗辉博士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新闻专业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分获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罗辉博士中英文俱佳，翻译风格恣肆洒脱，其博士学位论文即关于宗教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故为翻译该书的合适人选。作为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本人在此对罗辉博士能够在较短时期内高质量地完成这部在宗教与美国外交史领域目前最为出色的专著的翻译工作，表示衷心的祝贺。

2015年元旦于上海西郊

序

2003年3月,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耶鲁大学学生团体也被美国和伊拉克、乔治·W.布什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的对峙所吸引。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这几乎是一定的。无论人们对战争持何种观点、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耶鲁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都各执一词。从2002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一直到新的一年,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为发动战争找出好几条理由——从国家安全到推动民主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理由,不一而足。

这些理由中包括宗教。从对“9·11”恐怖袭击的最初反应到伊拉克战争前夕,布什自始至终都在用宗教来描述危机。布什没有必要总是使用美国为谁而战这样的话语:但有时也会说漏嘴,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把伊拉克战争描绘成对伊斯兰的十字军东征。然而,按照新闻报道的说法,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冬天和2003年的春天,布什总统相信他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对上帝的责任感,而且在美国陷入危机之时,是上帝指引着他的行动并保护着美国。布什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陈述战争理由,宣称:“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给这个世界的礼物,而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在赠予此种礼物的过程中,美国只是上帝在世间的工具:“我们美国人深深相信我们自己,但不只限于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会声称我们通晓人间和上苍的全部真理,但我们深信它们,并且对仁慈的上帝充满信心。愿上帝指引我们。”1个月之后,布什在纳什维尔告诉听众:“我们正在经受挑战,我们因自己的信仰而面临挑战。”他接着为伊拉克战争辩解,说那是针对仇视自由的原教旨主义者而进行的自卫战,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得到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一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就切齿痛恨,即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能够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崇拜万能的上帝。可能让他们

更为愤怒的是,我们不会改变。”^①

萨达姆·侯赛因同样使用宗教来形塑即将到来的战争。萨达姆宣称,与堕落的异教徒美国人不同的是,伊拉克人有着“光荣的信仰”,“真主不喜欢弱者”。受到总统鼓励的伊拉克神职人员也试图召集信众投入战斗。奥萨马·本·拉登是世俗伊拉克复兴党的公开敌人,但他传递出特别明确的宗教信息。这位基地组织的领袖在战争前的一段音频信息中警告说,美国人就是“要占领伊斯兰教旧都的十字军,这场十字军征战就是针对伊斯兰人民的战争”,是为了征服我们的宗教并偷走我们的石油,因此“所有的穆斯林,尤其是伊拉克的穆斯林必须准备行动,对此种令人厌恶的进攻展开圣战,并确保弹药和武器储备充足。这是他们的责任”。这是本·拉登自“9·11”以来一直传递的信息,事实上,这也是他自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进行首次圣战以来一直传递的信息。^②

那时我正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年轻讲师,距离我完成有关麦克乔治·邦迪和越南战争的起源的博士论文时间不长。在2002年的秋天,我在一个大班上讲授越战;在春季学期,我就冷战最动荡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开设了一个小型研讨班,内容涉及从约翰·F.肯尼迪的“猪湾事件”到吉米·卡特的伊朗人质危机在内的话题。这是一种离奇的体验,在考察冷战的同时,一段相似的历史正在我们面前实时展开。不过除了“9·11”所造成的创伤,2003年与1973年大不相同。美国不再脆弱,而是看起来不可战胜;美国没有受到越战这种灾难的影响,而是在冷战、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和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赶下台的过程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尽管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总统任期耗费在印度支那,记忆中似乎同样强大的总统乔治·W.布什却决定按照民主的美国形象改造中东。对于一个美国外交史的专家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

我的学生和我就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展开过许多讨论,正如我们对古巴和智利、越南和柬埔寨、伊朗人质事件和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些问

^①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28, 2003, PPP; George W. Bush, 2003, Book 1, 90;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 Convention in Nashville, Tennessee,” *ibid.*, 147, 150.

^② “Hardening His Tone, Hussein Challenges Inspectors and Talks of War Readiness,” *NYT*, February 15, 2003.

题的档案所进行过大量思考一样。只要他们避免哗众取宠的争论,同时将自己对于纷繁现实的判断建基于认真了解同样复杂的历史之上,我就对此表示鼓励。但是,令所有学生困惑的问题是:在通常讲求现实利益的外交世界中,尤其是美国外交中,何以会有宗教的一席之地?为何布什会利用宗教比喻和修辞来为他的外交政策辩解?这正常吗?在过去的百年中也有总统乞灵于上帝和耶稣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吗?又或者布什只是一个后现代世界中的前现代错乱?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但我所知道的就那么多:有些总统只是将宗教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常常被用于为干预进行解释或辩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是一种背景噪音和政治填充物,在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中并不特别重要。我让学生去研究几位常常受到怀疑的人物——伍德罗·威尔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吉米·卡特——他们恰好是非常虔诚又时而使用宗教言辞的领导人。仅有几位学者浅尝辄止地探讨了一点宗教与外交之间的更宽泛的联系,而我也将他们的书推荐给了学生。但在其他方面,我没有太多的思考。^①

我无法说出准确的时间,但就在那个春天的某个时间点,我开始对宗教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饶有兴趣地查看了一些书目指南、图书馆目录和期刊数据库。让我吃惊的是,现存文献并没有超越我向学生提过的那些常常被质疑之事。不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外正在出现。塞思·雅各布斯(Seth Jacobs)、米兰妮·麦克阿里斯特尔(Melani McAlister)和安德鲁·罗特(Andrew Rotter)这三位同事最近发表了令人激动且极富创新性的文章,阐释了冷战时期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雅各布斯讨论越南战争、麦克阿里斯特尔论及中东、罗特则研究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这些文章似乎是一般性的世俗规则中的某种一次性的宗教例外。我几乎不知道,这些文章已经处在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趋势的最前沿。^②

我对美国宗教史也非常熟悉,因此接下来转向这个领域。当查阅了相关

① 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聚焦于宗教与外交关系之间的联系,关于更全面的概述,参见 Tuveson, *Redeemer Nation*; Miscamble, "Catholic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tephanson, *Manifest Destiny*; McDougall,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以及 Philips, *Cousins' War*。更为晚近的研究,参见米德深刻而透彻的概述, Mead, "God's Country?"; 以及 Mead, *God and Gold*。

② Jacobs, "Our Systems Demands the Supreme Being"; 几年之后,雅各布斯将其重要论文放入 2004 年的书 *America's Miracle Man*。McAlister, *Epic Encounters* (第一版在 2001 年出版)。Rotter, "Christians, Muslims, and Hindus"; Rotter, *Comrades at Odds*, 220-248。

文献后,我发现某些非常有趣的事:宗教史学家研究外交就如同外交史学家研究宗教那样,既不常见也不系统。然而,他们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对宗教在战时和外交危机中的有趣讨论,尽管他们关注的是外交政策如何影响了宗教而不是相反。和外交史学家不同的是,宗教史学家并不仅仅关注常被质疑之事。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却又令人不安的奇怪发现。在形塑美国方面,很难想到有比宗教和外交事务影响更大的两个学科。也很难找到哪个学科的文像这两个学科的文那样浩繁、多元或者充满争议;在历史分析的类别中,大概只有种族和经济学能与之匹敌。至少对我来说,问题在于宗教史学家只对宗教问题感兴趣,比如,他们讨论一战并非为了解释战争,而是为了了解宗教如何对战争作出反应或者如何被战争所改变。同样,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对宗教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兴趣。这两个领域常见的现象是,彼此互相提及,却极少有学者以一种持续和有意义的方式来整合这两个学科。然而,这两个学科肯定有那样的历史瞬间,即以有趣和发人深省的方式进行会合。基于这样的见解,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来回答我学生的问题——当然也是我自己的问题。

C 目 录

序	1
---------	---

导 论	1
-----------	---

第一部分 “起 初”

第一章 信仰之捍卫者	18
第二章 上帝是一位优秀的战士	32
第三章 永久变革之战	49

第二部分 美国启示录

第四章 世界和谐被破坏	83
第五章 解放神学	95

第三部分 帝国的命运

第六章 专制主义者的叛教	117
第七章 国内外的仁慈帝国	131

第八章 天定命运与其异议	146
--------------	-----

第四部分 美国的使命

第九章 林肯和人道主义干预第一战	174
第十章 传教士和人权帝国主义	190
第十一章 同为上帝的选民	215
第十二章 古巴、菲律宾和第一次圣战	225

第五部分 伍德罗·威尔逊和第二次圣战

第十三章 理想主义的合成	258
第十四章 “基督精兵前进”	273
第十五章 威尔逊信条	297

第六部分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第三次圣战

第十六章 和平之君与现实主义先知	322
第十七章 富兰克林的简单信仰	342
第十八章 大屠杀与战争的道德意涵	355
第十九章 属灵外交	372
第二十章 不尚武的教会	397
第二十一章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对正义及持久和平的追求	419

第七部分 冷战和第四次圣战

第二十二章 哈里·杜鲁门的信仰及乔治·凯南的神学	453
第二十三章 冷战的大祭司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复临	478
第二十四章 教会大分裂与共识的神话	505

第八部分 改革与反改革

第二十五章 革命时代的革命教会·····	544
第二十六章 “死荫的幽谷”·····	565
第二十七章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	586
第二十八章 犹太—基督教的外交政策·····	609
第二十九章 狮心王罗纳德·····	626
尾声 最后一次圣战?·····	655
致 谢·····	670

导 论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这灵气的恶魔争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争战炽烈的时候，我们可以抵挡敌人；在战云已驱走后，还可以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仰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以弗所书》第6章第10—17节

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的写作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宗教在塑造美国对世界的认知以及美国应该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的国内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书不是关于宗教是否影响了美国外交关系的研究，而是研究宗教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几乎没有人会争辩宗教在美国生活中所扮演的持续而重要的角色。

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本书同样还认为，宗教与其他历史性课题无异。我既不愿意也不打算用证据支持或者反对宗教在公共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读者们当然可以使用本书中的材料来支持他们的信仰，或认为宗教是美国外交关系中有益的力量，或者是邪恶的力量。无论是关于宗教在公共广场中的位置，还是关于宗教本身的性质为何，这场辩论的双方都能在本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他们各自完全不同的主张。但是我并不关心这样的争论。宗教